

沒有南部就沒有印度

葡萄牙人對荷蘭人來到東方的感受

洛瑞羅*

1595年，由科內利斯·德·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率領的一支荷蘭遠征隊首次冒險航行越過好望角，在亞洲海洋上向葡萄牙人發起挑戰。這一事件不僅對荷蘭和澤蘭(Zelândia)，而且對於葡萄牙和“印度國”來說都是一個異乎尋常的轉折點，就更不用說它給整個歐洲和亞洲造成的種種麻煩了。有關荷蘭人怎樣緩慢而無情地建造其東方帝國的歷史一直被世人不斷傳誦着，甚至其建造這一帝國的各個階段都廣為人知。但是，本文之目的不是要介紹這些史實，而是要探討葡萄牙人對荷蘭和澤蘭船艦從16世紀初開始出現在亞洲海域有怎樣的反應，對所謂“荷蘭人的威脅”有甚麼感受。對於這個問題，看來並沒有引起近代史學家們特別的注意。當然，本文對此問題的探討顯然也祇是初步的，儘管會提供大量的相關資料，而這些史料無疑值得有興趣的學者們將來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1578年，年輕的君主唐·塞巴斯蒂昂(D. Sebastião)不幸逝世於摩洛哥北部城市凱比爾堡(Ksar-el-Kebir)，導致葡萄牙王位無人繼承。不過，好在這個時候，葡萄牙國王的臣民們已在整整八十年前就着手創建了一個通常稱為“印度國”的富有特色的東方帝國。當時，這些葡萄牙人白手起家，在亞洲海域漫長海岸線上的戰略要地建立了一個個要塞、炮臺和商貿網點，它們之間均有固定的航線相連接；他們還憑藉武力或通

過外交手段在亞洲許多地方獲得了進行奢侈品貿易的大量配額，並以好望角為基地牢牢地控制了海域的航行權。葡萄牙人所壟斷的“印度航線”曾經在數十年內向歐洲市場供應了亞洲最珍貴的天然物品和手工藝品，特別是香料、藥材、陶瓷、紡織品和寶石等。“印度國”乃是葡萄牙人開創之事業的產物，其首府設於果阿(Goa)；它猶如一部複雜機器，不僅是行政管理機構，同時也是造船基地和軍事基地。

與此同時，那些不再為王室効勞的葡萄牙軍人和商人還在亞洲建立了另一個為其私慾服務的非正式的葡萄牙帝國。這個被近代某些史學家稱為“影子帝國”背離昔日葡萄牙人大發現時進行亞洲貿易的運作機制，因為他們在16世紀頭幾十年內發現，在東方世界，那些最富於冒險精神的人，那些擁有一定基本財富，譬如一艘商船、一筆不多的投資資本或在航海領域有某些專長或具有一些作戰本領的人，最有可能撈到大錢。於是，許多葡萄牙人在為葡萄牙王國効勞一段時間之後便不回國，而滯留在東方從事商業貿易活動或為亞洲當地的一些王國充當僱傭軍以尋求財富。隨着時間推移，一個個葡人群體便在東方沿海地區、特別是在能夠躲避強大的“印度國”控制的地區逐步定居了下來。⁽¹⁾

當1581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擊敗那些不具有如此充足“條件”之對手、被托馬爾(Tomar)王

*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里斯本大學歷史學博士，葡萄牙拉各斯市政廳項目主任，里斯本新大學海外歷史中心研究員。

室們擁戴登上葡萄牙王國寶座時，許多葡人已在亞洲廣闊的地域定居下來。與此同時，“印度航線”也早已正規地運作了起來。1582年，伊比利亞王國政府收到一份根據里斯本擁有的書面資料和一些有海外經歷的人所提供的口頭資訊編撰的未具名報告。⁽¹⁾該報告後來十分出名，實際上也就是學者們經常引用到的《葡萄牙在印度地區的城市及要塞記事》。其中扼要介紹了葡人在好望角以遠領域所擁有的領地和利益情況。⁽²⁾關於葡人在印度洋沿岸的情況，該報告指出，除在果阿地區所擁有強大的軍事基地之外，葡人在印度斯坦西部至少有二十三座要塞，在霍爾木茲海峽至少有四座，在非洲東海岸至少有兩座，在錫蘭至少有兩座，在科羅曼德爾沿岸也至少有兩座。報告還清楚地指出1582年前後葡人的統轄集中

在印度西部及其附近地區。這一片具有戰略意義的廣袤地域始終被置於葡萄牙的“戰艦、武器及軍事人員”的保護之下。⁽³⁾不過，其東部地區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因為在東南亞及東亞廣大地區，葡王國能夠有效控制的地方事實上非常有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祇有馬六甲幾個港口城市以及澳門，還有就是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包括蒂多雷(Tidore)、安汶(Amboíno)和索洛爾(Solor)在內的五、六個要塞炮臺。至於在更遠的東亞地區，葡萄牙的官方事業就不得不面對更大的天然的和人為的障礙。儘管被葡人稱為“南部”的地區是亞洲某些寶貴財富的源泉，但確是當時強大而過份遼闊的“印度國”⁽⁴⁾之力量最為薄弱的地方，因為那裡存在着一個“影子帝國”。



里斯本圖

引自布勞紐斯和霍根伯格(G. Braunius、F. Hogenberg)之 *Civitates Orbis Terrarum*，安特衛普(荷蘭)·1618

1580年前後，葡人已經在亞洲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了。儘管他們在伊斯蘭教佔主導地位的一些地區遭到反抗，但總的來說，他們出現在亞洲廣大沿海地區時還是受到歡迎的，被當地人看作是絕對普通的貿易、外交和軍事夥伴。因此，葡萄牙在這些地區的航行和貿易都很正常，其船隻可以從莫桑比克島到印度尼西亞群島最偏遠的島嶼的亞洲海域內自由航行而不會遭到任何反抗，可以在這個區域內所有大港口城市安全停泊，通常祇是在亞琛（Achém）等少數地區遇到一些問題。所以，葡船無須攜帶過多的武器彈藥，每艘船隻祇要裝備幾門由有經驗的專業人員操縱的大炮就足以對付可能發生的意外。這樣一來，船上的空間就可以更多地用於運輸商品了。那時，在航行於亞洲海域的一艘葡船，不管其噸位多少，很少有配備超過十五到二十門輕炮的。⁽⁵⁾此外，葡人隨着參與亞洲貿易的時間的推移，逐步開始運用起比自己的重型船隻更輕快的當地船隻來做生意了。

16世紀末，有些看來是懷念昔日葡王國船隻大量攜帶沉重武器膽戰心驚地航行於亞洲海域的暴力歲月的葡萄牙作者，開始激烈地批評上述這一幾乎是和平的航行景象，指責那些早於荷蘭人出現在亞洲海域的葡萄牙老兵們不該棄武從商。除此之外，葡王國知名的亞洲編年史家迪奧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也對此發聲。他在1569年發表的《注重實際的戰士對話》中寫道：“過去人們到達印度時都要詢問最邊遠的要塞是哪個，哪些要塞裝備有武器，以便知道哪個要塞是他最值得去服務的。但是現在，由於某些人的貪慾如此膨脹，以至於他們一來到東方某地，便有人問他們：誰願意去中國、日本、孟加拉或巽他(Sunda)群島？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說，他們要去那些讓其相信將會成為“摩爾人對我們所說的能使其成為商人而不是仍成為過去征服印度的那種騎士的地方。”⁽⁶⁾

1582年前後，“印度國”已經變得非常強大，儘管迪奧戈·多·科托在其後的一些著作中繼續指責當時的同胞出於追逐最平庸的商業目

的，早已拋棄了前輩們通過軍事手段贏來的財產。⁽⁷⁾實際上並非如他批評的那樣，事實是在16世紀末期，所有的葡萄牙士兵在他們所到之處，仍然在繼續進行各種充滿暴力的軍事活動，儘管這些軍事活動就其規模來講比其先輩們確實遜色多了。因為他們從心底裡不情願參與這樣的活動，也不願意捲入統一的伊比利亞王國的政治圖謀之中。⁽⁸⁾科托也如所謂“沒落文學派”的其他門徒一樣，總是經常描述某些社會群體的秩序是如何過時如何走向沒落，並說這種沒落進程已經成為普遍化的趨勢等等。⁽⁹⁾與此同時，儘管在亞洲的貿易一直正常進行，但向“印度國”敲響警鐘的第一個信號已經出現在大西洋了，因為自1591年起，行駛在“印度航線”上的船隻開始接到不要靠近聖海倫娜島(Ilha de Santa Helena)的警示，因為那裡很不安全，有太多危險。⁽¹⁰⁾葡船在駛回歐洲時通常都要在這個位於大西洋南部的島嶼作中途停留，以便補充飲用水儲備。但是，這些船隻同樣通常都從亞洲運來過多的商品而超載航行，因此這些商船要抵抗來自經常遊弋在那一海域的敵船之任何奇襲便變得極其困難。⁽¹¹⁾所以，率領船隊駛回葡萄牙的船長們都得到要進行封閉式航行的命令，船上要加強炮彈和軍事人員的配備，上層甲板要始終保持暢通無阻，特別是要盡可能避開聖海倫娜島行駛。⁽¹²⁾

如上所述，1595年對於亞洲的葡人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歷史轉折點，然而他們祇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意識到這一新的總形勢，儘管在此之前他們就不祇一次接到來自歐洲的相關通告。譬如在前一年即1594年，果阿總督就收到伊比利亞王國政府的一封信，警告他說可能有懸掛別國旗幟的船艦試圖駛過好望角來到亞洲，特別是可能到建有“葡萄牙要塞和駐紮有葡萄牙艦隊”的“孟加拉、勃固(Pegú)和撒馬特拉(Çamatra)”等地區；信中還要“印度國”總督不僅要警惕來自歐洲的可能侵入，還要採取措施避免這樣的侵入“得到摩爾人異教徒的支援”。⁽¹³⁾次年，印度總督又收到里斯本新的函件，通知他

說“將有一些船艦從弗蘭德斯(Framdes)啟航來到東方的這些地區”。⁽¹⁴⁾實際上是由科內利斯·德·霍特曼率領的四艘荷蘭商船從北歐啟航駛來東方。這位船長曾在里斯本居住過，現在可以推斷的他在里斯本居住期間肯定收集了指揮遠征船隊來到東方所需的足夠資料。

儘管此次航行最終並沒有取得特別引人注目的成果，但它為荷蘭人開闢了通往東印度的航路，探尋了一條直接從好望角到爪哇島南海岸的南部新航線。此前葡人從未嘗試走類似的航路，顯然他們不需要這樣做。科內利斯·德·霍特曼事實上是聽了他的同胞簡·哈依吉恩·範·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忠告才這樣做的。這位荷蘭旅行家之前曾在強大的“印度國”首府果阿呆過。他在其1595年出版的《東印度之旅》中詳細地描繪了在印度尼西亞群島見到的財富，斷言爪哇“是個進行貿易不會遇到任何麻煩的好地方，因為葡人還沒有到達這裡，祇是爪哇人把他們的一切運到馬六甲市場上去出售”。⁽¹⁵⁾荷蘭船隊實際上穿越了印度尼西亞的海域，在八個月的航程中從未碰見過葡人的任何船隻。但根據葡萄牙的一份資料，他們至少在爪哇島的萬丹省(Bantam)受到了在那裡定居的部分葡商人的友好接待，這些葡人向他們提供了“當地的第一手資訊資料”。馬六甲的一對葡人夫婦，男的名為佩羅·德·阿塔依德(Pêro de Ataíde)，甚至對那些荷蘭人說：“在那裡可能會遭到襲擊，建議他們要盡早提高警惕，以防爪哇人對他們下手。”⁽¹⁶⁾現在看來，當時在那裡的一部分葡人企圖挑起荷蘭人同萬丹當局之間的衝突，想讓當地政府敵視那些荷蘭人。一些年之後，葡萄牙“印度國”的一個文書對此這樣評論：如果沒有這對葡萄牙夫婦不適當的提醒，或許爪哇人就實施了他們的暴力計劃，這樣一來，“那些荷蘭人就永遠回不了老家了”。⁽¹⁷⁾由於這對葡萄牙夫婦向荷蘭人提供了重要資訊，結果葡萄牙在當地的許多情況都出現在荷蘭人結束遠征之後所編寫的報告中和所繪製的地圖上了。⁽¹⁸⁾

荷蘭遠征船隊在結束了一次漫長而錯綜複雜的旅行之後，終於在1597年回到了他們的國家。他們帶回的資訊清楚地證明葡人壟斷的“好望角航線”已完全停滯，於是荷蘭人立即着手準備新的遠征亞洲的事業。與此同時，根據1596年和1597年從印度寄至葡萄牙的官方函件可以推斷：這時在“印度國”這裡卻一切風平浪靜，似乎覺得沒有任何理由再驚慌失措了，因為在那些函件中根本就沒有一個字提到荷蘭人遠征的事。不過，稍晚些的著述中卻呈現一種迥然不同的景象。譬如，迪奧戈·多·科托在其1611年撰寫的《第十二個十年》就提到當1597年8月果阿當局得到荷蘭人抵達東方海域的消息時，由於這些人“過去從未到過印度這些海域，全城頓時騷動了起來，連孔德(總督)也驚恐萬分。於是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因為他們感到如果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得到確認，那些荷蘭人“就可能毀壞我們在馬六甲設立的要塞炮臺，就可能破壞印度在那個地區的商業貿易，就可能搶奪中國及日本的商船”⁽¹⁹⁾。

科托顯然很瞭解隨後事態的發展。根據他的記述，在上述“印度國”總督召集的會議上作出決定：祇要季風允許，就派遣一支艦隊去馬六甲，“以確保那個地區的安全，並尋找荷蘭人的船隊”⁽²⁰⁾。這支艦隊從果阿啟航駛向南部海域。但其艦長洛倫索·德·布里托(Lourenço de Brito)卻表現出對搶劫來自爪哇和福建的商船比尋找荷蘭人船隊更有興趣，儘管他在馬六甲瞭解到霍特曼遠征船隊的兩名船員已經開小差到了巴厘(Bali)。這樣一來，布里托率領的這次緊急出征不但最終甚麼成果都沒有取得就返回了印度，反而在巽他卡拉帕海域(Sunda-Kalapa)同爪哇人的戰鬥中損失了幾艘船。由於未完成所肩負的使命，被判處向葡王交納一筆罰金。但不久他又擔任了“索法拉號”船長。事實表明，這顆航海之星的光芒總是在果阿的葡萄牙當局閃亮。⁽²¹⁾有史料表明，看來最終給葡人敲警鐘的並不是荷蘭船隊，而是英國人的另一支遠征船隊。⁽²²⁾在那些年

間，葡人把英人誤認為荷蘭人或把荷蘭人誤認成英國人的情況並不罕見。

現在人們不難理解當時在果阿為甚麼沒有甚麼警覺。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印度國”所管轄的範圍非常大卻很分散，其貿易、外交和軍事部門分管的事務遍及各個領域。這樣一來，一些穿越南部海域的歐洲船隻就很可能不會引起設在亞洲葡萄牙帝國地理中心的某個觀察人員的警覺。這種情況在葡萄牙本土就不會發生。在那裡每年除了偶爾收到從陸路寄來的零星的東方來函之外，每年同東方的唯一接觸就祇有一次，那就是當“印度航線”的商船到來的時候。因而在航海過程中出現任何麻煩都會立刻引起重視；負責管理海外事務的葡萄牙當局很快就會知道荷蘭人遠征東印度的船隊可能給葡萄牙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於是，當科內利斯·德·霍特曼率領的船隊起航駛向東方海域的消息一傳到里斯本，立刻在1598年就有各種函件寄到果阿政治領導人手中。這些函件首先通報說，“荷蘭船隊不久就會抵達東印度海域”⁽²³⁾，然後指示總督要“抗擊任何來自正在逼近的歐洲船隊的威脅”，要“立刻派遣足夠的軍事力量到那些地區執行防衛任務”⁽²⁴⁾，還必須認真研究究竟需要採取哪些有力措施來保衛馬六甲港口等⁽²⁵⁾。接着又下達補充命令，要求嚴懲居住在爪哇的那些曾經向荷蘭人提供過幫助的葡萄牙人⁽²⁶⁾；最後還於1598年派遣一艘戰艦從里斯本徑直駛向印度尼西亞群島，指揮員為科斯梅·德·拉費塔(Cosme de Lafetá)，其任務是“尋找敵人船隊、阻止其可能在馬六甲港口停靠上岸、進而強佔馬六甲炮臺及在那裡劫掠胡椒、藥材和其它商品”⁽²⁷⁾。

然而，荷蘭船隊根本無視葡萄牙當局可能採取的那些抗擊措施，全速駛向東方海域，尋找和利用一切機會同亞洲人做生意。由於在1580年後，按照傳統的規矩，荷蘭人要得到東方的商品祇有通過里斯本港口購買，因此他們感到太受限制。所以，“在1598年，分屬五個行業的荷蘭公司聯合派出總共二十二艘商船啟航來到東方”，

試圖衝破這種約束。其中一些船隻走“好望角航線”，另一些穿越麥哲倫海峽前來。⁽²⁸⁾十分有意思的是，直到其後的一年，即1599年，寄自果阿的一些函件中仍然沒有一個字提到荷蘭人的事。然而就是在這一年，所有這些荷蘭商船就已經出現在印度洋。沒過多久，他們的許多船隻就滿載着他們在菲律賓及印度尼西亞各港口獲得的大量珍貴商品啟航回國了。⁽²⁹⁾他們的活動進行得如此順利，正如一位耶穌會士在幾年之後所分析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大”，而在所到之處“基本上沒有遭遇到葡人的抵抗”。⁽³⁰⁾

但是，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在其後的史料中去尋找更多的資訊。根據曾經在果阿待過的迪奧戈·多·科托的記述，還有數目不詳的一些荷蘭船隻“曾在莫桑比克島附近海域停留儲備飲用水，然後揚帆來到果阿附近的印度洋沿岸，隨後又全速駛向科摩林角(Comorim)，在那裡他們遇到並俘獲和劫掠了一些葡萄牙商船，但是對葡人他們沒有招惹，搶劫之後就放他們繼續航行了。接着，荷蘭船隊“從那裡駛向馬六甲附近海域”⁽³¹⁾。看來，這兩艘荷蘭船隻就是1599年1月在“普魯帕塞拉爾”(Puluparcelar)附近遭遇一支從馬六甲返回的葡艦隊襲擊的船隻。儘管他們掛起了白旗，仍然遭到葡人炮轟，於是即刻爆發了一場持續了八天的激烈海戰。最後，葡艦隊駛向科欽(Cochim)，而完全被摧毀的荷蘭船隻則狼狽地逃到了馬來半島的吉打(Quedá)港。就在這年，這兩艘荷蘭船隻最終在馬達班沿海遭遇海難。⁽³²⁾

其它一些荷蘭船隻，譬如由雅各·范·內克(Jacob van Neck)率領的幾艘命運則要好些。他們在爪哇停留一段時間之後，於1599年6月回到了祖國。⁽³³⁾但這次荷蘭遠征隊的詳細情況，根據現存的來自亞洲的史料，基本上還不清楚，祇是在迪奧戈·多·科托隨後的著述中有零星提及。其中說到，果阿在得到有關“那些荷蘭船隻已經過了爪哇”的消息之後，便派遣一些戰艦開赴馬

六甲。⁽³⁴⁾不過，根據現存史料，里斯本的葡萄牙統治者們早在1599年8月之前就收到來自北歐的關於有四艘船隻不久前滿載着香料從印度回到阿姆斯特丹的消息，於是立刻寫信給菲利普三世，對荷蘭人一再的襲擊表示嚴重關切。信中寫道：“荷蘭人這次遠征有可能導致印度南部的丟失，導致陛下臣屬的損失，乃至於其它方面的種種損失，這一切對印度來說無疑都將是致命的。”⁽³⁵⁾

由於這樣，菲利普三世對亞洲形勢十分擔憂，但始終未收到來自果阿的有關此事的任何報告。因此在1600年先後給果阿發出了幾封信函，首先告誡馬六甲首領“對馬六甲炮臺的情況任何時候都要了若指掌，因為其地位實在太重要了，特別是現在更要重視保護，因為荷蘭人正沿爪哇海岸航行，行將抵達巽他(Sunda)群島做生意”⁽³⁶⁾，然後指示新任總督艾雷斯·德·薩爾

達尼亞(Aires de Saldanha)“要打擊那些正在駛向巽他群島試圖同那裡的當地人進行交易的荷蘭人，要處罰向這些荷蘭人提供方便的人，因為“如果這些歐洲人在那些地區長久地待了下來”，勢必將給“印度國”造成諸多麻煩和損失⁽³⁷⁾，接着又先後給馬來半島、薩馬特拉和爪哇的八個地方當權者發去函件⁽³⁸⁾，請求他們支援葡人反抗“那些敢於去巽他和爪哇那些地區進行貿易的荷蘭人”或者打擊“所有在其港口歡迎荷蘭人到來的人”⁽³⁹⁾。與果阿當局相反的是，里斯本和馬德里的統治者們很快就認識到荷蘭人對葡人在東方的利益構成的威脅。他們之所以認識得如此之快，很可能同下列事實相關：在1599年，一支荷蘭艦隊曾經封鎖過特茹河河口，甚至給葡萄牙首都的大門帶來了戰爭威脅。

雅各·范·赫恩斯科爾克(Jacob van Heemskerck)和威布蘭德·范·沃里克(Wybrand



1619年菲利普二世抵達時的里斯本

引自若奧·巴蒂斯塔·拉瓦尼亞(João Baptista Lavanha)之《菲利普二世陛下訪問葡萄牙王國》，馬德里·1622年

van Warwijck)率領的遠征船隊同樣非常幸運。他們是在訪問了印度尼西亞最東部的一些島嶼之後於1600年5月至8月間回到荷蘭的。⁽⁴⁰⁾他們率領的一些船隻在聖海倫娜島(Santa Helena)遇到一艘從印度回葡萄牙的商船，於是他們之間隨即展開了激烈的戰鬥。若昂·多斯·桑托斯(João dos Santos)修士乘坐該艘葡船，之後在其《東方埃塞俄比亞》中講述了這次事件。該書1609年在埃武拉(Évora)出版。他在書中詳細地描述了這次戰鬥，他說戰鬥一直進行到敵人最終不得不逃跑為止。此外，他還提供了一些關於荷蘭人的有趣情況。據這位天主教多明我教士所述，在聖海倫娜島上的葡人“從小教堂的牆上取下敵人在那裡留下的大量條幅和標牌之類的東西，上面記錄着他們如何從其家鄉荷蘭和澤蘭出發及其在航海途中的情況”。作者還寫道，荷蘭人“曾到爪哇做生意，用鍍銀假銅幣在那裡購買的胡椒及其他物品幾乎裝滿了他們的船隻”。但正在這時，爪哇人發現了他們得到的“錢幣是假的”，於是將荷蘭人全部抓了起來，奪回了已經裝上船的貨物，甚至還“想奪取他們的所有船隻”，最終另一支荷蘭遠征船隊的同胞們為他們交納了罰款，不過這次給的錢幣倒都是真的了。⁽⁴¹⁾

葡萄牙的史料中還提到荷蘭人馬魯古群島之行的一些情況，說他們的出現引起了居住在那裡的葡人極度驚慌，因為那些遙遠地區對於“印度國”說來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那裡盛產各種珍貴香料。一位曾在安汶地區(Amboíno)傳教的耶穌會士在1599年懷着幾分惶恐的心情記錄道：一共有四艘荷蘭船隻抵達這裡，好像是來“懲罰我們的罪孽”的⁽⁴²⁾。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入侵的各種反應很快就傳到了馬尼拉，那裡的西班牙當局對此給予了特別的關注，迅速派出一艘船攜帶着給伊比利亞王國政府的數份報告駛向新西班牙。⁽⁴³⁾次年，即1600年，另一位同樣在阿莫依諾任職的名叫路易士·費爾南德斯(Luís Fernandes)的神甫也報告說，荷蘭人分別在班達(Banda)和特爾納特弄到了大量香料，並在這兩

個島嶼物色了代理商。這些荷蘭人帶來的東西一再引起葡人擔憂：“他們供給基督之名的敵人——摩爾人各種武器；這些摩爾人在荷蘭人的支持下和擁有這些武器之後變得更強大了，在我們面前總是表現出高傲狂妄和不可一世的樣子。”⁽⁴⁴⁾

由於一些伊斯蘭教統治者的長期而頑強的反對，居住在馬魯古群島的葡人日子過得並不太平。實際上，那些島嶼總是處在戰爭狀態裡，從那裡弄到香料必須付出高昂代價，特別要花大量力量來加以保衛。在這之前的若干年裡，葡人甚至被驅逐出了特爾納特，要知道這個地方自1521年以來就是葡人的基地了。在這種情況下，葡人不得不到蒂多雷島(Tidore)去佔領一些新的陣地。⁽⁴⁵⁾正如居住在那裡的葡人很快意識到的，他們的對手荷蘭人從歐洲來到馬魯古必然令本來就不太平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根據稍晚些時候的一份西班牙史料，荷蘭人同葡人在馬魯古群島的初期軍事對抗恰恰發生在1599年，當時那些武裝到牙齒的荷蘭人同特爾納特當地的王子勾結，向葡萄牙蒂多雷聯軍發動了猛烈的進攻。⁽⁴⁶⁾但是，通過分析所有現存的史料，我們認為至今還難以做出結論，究竟是誰首先挑起了這場衝突的，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當時葡人正在同特爾納特當地人作戰；如果是荷蘭人首先發動了對葡人的進攻，那他們選擇葡人當時的敵人做盟軍和貿易夥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600年的前幾個月，一支從太平洋開來的荷蘭船隻，也就是由雅克·馬胡(Jacques Mahu)率領的1598年從鹿特丹起航向南美洲方向駛去的遠征船隊中的一艘倖存船隻，儘管因在航程中遭遇海難而被毀，但在經過漫長的橫渡海洋之後，終於抵達了蒂多雷。然而據荷蘭人所述，葡人對他們真是慘無人道，竟然將所有的荷蘭海員殘忍地消滅了，充分表現出了空前的敵視態度，而過去荷蘭方面卻從未以這種方式來對待“印度國”。⁽⁴⁷⁾迪奧戈·多·科托也在其亞洲編年史中兩次提到了這艘荷蘭船隻到達蒂多

雷一事，祇不過並沒有提供任何詳細情況。⁽⁴⁸⁾然而，在該事件發生後不久從蒂多雷發出一封信件講述了這一事件的一些具體情況。根據該信件，這艘已被毀得不成樣子的荷蘭船隻似乎是“馬魯古之旅”的總指揮若昂·平托·德·莫拉依斯(João Pinto de Morais)船長率領的船隊中的一艘船隻拖到蒂多雷港的，接着一些帶着十字架的葡人便登上了該船。在船上經過三天的平靜相處之後，終於在一個名叫雅科梅·德·莫拉依斯(Jacome de Morais)的葡萄牙船長和荷蘭船長巴爾薩澤·德·科爾德斯(Balthasar de Cordes)之間發生了意外衝突，結果是荷蘭船長被打死了。於是，船上的僅攜帶馬來亞匕首的葡人不得不躲到船尾，而荷蘭人則“立刻拿起武器殺死了其中的三個葡人”，並試圖去動用安放在船尾的幾門大炮，準備進一步報復。局面最終被若昂·平托控制住了，他帶着四個步兵上船，隨即“打死了四、五個正在搏鬥的人”，並阻止其餘人動用大炮。不過，該葡文信件並沒有講到倖存的那十八、九個荷蘭人最終的結局如何⁽⁴⁹⁾，很有可能被押解到了印度，他們隨身攜帶的一些書籍由果阿宗教裁判所進行了檢查，因為擔心他們在那裡傳播改革派理論。結果在檢查中意外地發現，這些荷蘭囚徒攜帶的書籍中有《荷蘭聖經》，於是立即加以沒收焚燬。⁽⁵⁰⁾

現存荷蘭史料中提到，1601年雅各·范·內克率領船隊又回到東方，一直航行到馬魯古群島。在那裡他攻打葡人的蒂多雷炮臺，據說是為了報復葡人在上述事件中對自己同胞施用的暴行。⁽⁵¹⁾不過，之後曾在北大年(Patane)見過內克這支船隊的佛蘭德旅行家雅克·德·科特雷(Jacques de Coutre)在其遊記中對該事件提供了另外一個版本。他說內克攻打那炮臺是“為了看看是否能奪回以前曾被一個名叫若昂·平托·莫拉依斯的葡人用欺騙伎倆奪走的、當時正停靠在蒂多雷炮臺牆下的一條雙桅小船”。接着他補充說，那位荷蘭艦隊總司令其實“並沒有帶來報復葡人的命令”⁽⁵²⁾。此外，他還提到上述那艘從太平洋駛來

的結果被葡人扣留在蒂多雷港的荷蘭船隻。他不讚成那種認為就是這艘船引起了葡人和荷蘭人之間嚴重衝突的說法，他反問道難道這艘船真的有如此大的威力嗎？他接着指出，實際情況是在這之前，葡人與荷蘭人之間早已發生過各種小摩擦了。蒂多雷炮臺的葡萄牙司令員在一封信函中也講到當時葡人和荷蘭人之間確實經常發生各種衝突和摩擦。⁽⁵³⁾總之，以下事實是無疑的：這支荷蘭船隊的確是從南美洲那邊來，他們經過那裡時襲擊了智利沿海的船隻，並俘獲了一艘西班牙船；此外，荷蘭德特隆號船上裝載的那些財物很可能就是葡人同荷蘭人之間的首次對抗後所獲得的成果。

一位那些年任職於蒂多雷炮臺的耶蘇會神甫曾寫道，范·內克的炮擊並沒有造成葡人的任何傷亡，倒是“我們的人打死了他的許多幹將，擊壞了他的一些船隻，於是他們為了不至全軍覆沒而不得不割斷纜繩，留下兩個錨就逃走了。”⁽⁵⁴⁾另一封來自馬魯古的信件描繪了他在那裡見到的令人感到悲傷的場景。荷蘭人的“大量船隻每年都要連續不斷地來到這裡，而每次都要在所到之處物色新的代理商”；總要帶來“許多當地馬魯古人最需要的物品，例如步槍、火槍、火藥、鉛彈、性能優越的大炮和各式各樣的武器”；而他們在這裡卻不像葡人那樣，每到一處都要在當地人中宣揚基督教義，甚至將其中的一些人“變成基督教徒或改變其信仰”等。所有這些原因使得新到馬魯古的這些歐洲人自然是被那些葡人的敵人看作是理想的貿易夥伴，從而令當地人感到“非常滿意”。⁽⁵⁵⁾

雅克·德·科特雷在其作品中同樣提到范·內克船隊在那一年抵達葡人的另一個定居點的不幸遭遇。這些荷蘭人從馬魯古群島啟航後向北行駛，旨在到達中國沿海尋找商機。當到達由葡人得到中國當局許可而從1557年起開始控制的重要港口城市澳門的附近海域後，給澳門當局發去了一封問候函件。他們或許是受到手持白旗的葡人吸引而“毫無提防地靠岸登陸，因為他們認為看

到白旗就是看到了和平的信號。葡人確實首先接待了他們，然而接着就把他們統統都絞死了，祇有一個名叫馬蒂納斯·阿皮尤斯(Martinus Apius)的所謂“監察員”沒有被殺。⁽⁵⁶⁾關於此次澳門事件在耶穌會史料中也有提及。費爾南·戈雷羅(Fernão Guerreiro)於1605年在里斯本發表的作品中所講述的同科特雷的說法相當類似，祇有一點事實不同，即：戈雷羅強調說，升起白旗的不是葡人，而是荷蘭人船隊。不過，以下事實毫無疑問：澳門的葡人視不速之客為危險的敵人，因為那些被俘獲的荷蘭人“承認是來尋找商機的，是到這些地方來做生意的”。⁽⁵⁷⁾葡人十分清楚，任何外國人對澳門的干預都會立即損壞他們在若干年之前就同廣東當局建立起來的友好關係。他們不希望其他外國人對其同中國人的貿易有絲毫的干預，因為中國當局允許他們控制澳門這塊土地的承諾是通過極其艱難的努力才獲得的。⁽⁵⁸⁾在這之前不久，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就曾一再進行嘗試，希望能在中國建立一個堅實的基地，但西班牙人所有的嘗試最後都因葡人的積極活動而落空了⁽⁵⁹⁾，何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當時還都是同一個君主的臣民呢！根據一些耶穌會士的信件所述，除了其中幾個皈依了天主教的之外，所有“被俘獲的”荷蘭人都被處決了。這些人表示“請求天主以及到場信徒們的寬恕，祇要是這樣即使被處死了也會感到寬慰”。⁽⁶⁰⁾雅克·德·科特雷認為，對於此事件的責任可能應歸於澳門的特別法官。⁽⁶¹⁾根據相關規定，應該是他才擁有下令處決這些荷蘭人的權力。⁽⁶²⁾

澳門發生的上述事件一直以來都被看成是導致葡人和荷蘭人之間在東方關係破裂的一個轉折點，因為據說在雅各·范·內克回到歐洲之後的荷蘭遠征船隊對葡人都持公開敵視態度，開始執行蓄意打擊葡人的陣地和蓄意損害其利益的政策。⁽⁶³⁾不過，對於那個時期的另外一些史料也值得我們給予應有的注意。除了上述發生的事件之外，在另一方面，我們手中也有一個當時定居於蒂多雷的傳教士提供的證

據。這位傳教士在1601年的一封信件中寫到，在那裡被葡人抓獲的一個荷蘭人供認：荷蘭人“曾得到奧蘭治親王(Príncipe de Orange)下達的摧毀所發現的所有葡人和卡斯蒂利亞人據點的命令”，使他們打仗沒有兵營，甚至沒有一切；根據該命令，與此同時，還應該同東印度當地的伊斯蘭教統治者們結盟。⁽⁶⁴⁾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了雅克·德·科特雷提供的證據。根據他的記述，當1601年他在北大年(Patane)停留時，親眼目睹了雅各·范·赫恩斯科爾克率領的艦隊到達那裡的情形，他們帶着一艘在泗水(Surabaia，又譯為“蘇臘巴亞”)俘獲的葡商船作備用。⁽⁶⁵⁾另外一些葡萄牙史料確認了這一暴力行為，並補充說：那艘船是“從索洛島開來的”，荷蘭人俘獲了之後，“殺了船上的一些葡人，另一些被抓了起來”⁽⁶⁶⁾。現有可靠的資料證明，葡人與荷蘭人之間的敵對狀態的確始於上述澳門事件發生之前。

在隨後的若干年裡局勢似乎更為惡化了，因為荷蘭人並不會放棄同東印度建立牢固的貿易關係的企圖，而葡萄牙或者說這時期的伊比利亞王國也決不會放棄最大限度地阻止其企圖的實現。事實上，1601年從馬德里寄至“印度國”總督的幾封函件都要他採取嚴厲措施來頂住荷蘭人的威脅。馬德里的命令十分清楚，就是要求葡萄牙總督必須親臨南部地區指揮搜尋、襲擊和摧毀敵船的行動，“以防止任何一艘荷蘭船隻返回歐洲”⁽⁶⁷⁾。果阿葡萄牙當局採取的具體措施中包括籌建一支由安德列·弗爾塔多·德·門東薩(André Furtado de Mendonça)所指揮的征伐部隊⁽⁶⁸⁾，以實施伊比利亞王國政府制定的堅決反對荷蘭人的進攻性政策。至於荷蘭人對葡萄牙在東方所擁有的利益和陣地所持的態度，根據葡萄牙文獻資料，直到1601年還不是一貫的和前後一致的：就像一個世紀之前葡人自己來到亞洲海域時所做的一樣，除了在必要時採用暴力手段之外，一般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盡量去適應當時的環境。

正如一位葡船長在1602年航海日誌中記載的那樣，荷蘭商船當時經常神氣活現地出沒在南部海域。⁽⁶⁹⁾他們憑藉事先搜集的資訊，直接開到生產最珍貴香料的地區，盡可能避免同葡人碰面。就像一個葡萄牙傳教士不得不承認的那樣，荷蘭人在進行改宗活動方面，真是表現出了完全的大公無私：“在同當地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荷蘭人比較注意尊重他們的法律和派別，少有企圖爭取他們皈依基督教，因此令他們感到滿意和高興。”⁽⁷⁰⁾在印度尼西亞群島某些地方的形勢以前就十分緊張；面對這種情況，荷蘭人既不去利用，也不捲入葡人同當地的一些伊斯蘭教當權者之間的公開的或潛在的衝突。即使有時葡人在這裡或在那裡俘獲了荷蘭遠征隊的某一艘迷航的商船，在最初的一段時期他們也沒有對葡人一概採取暴力報復的態度。對於這種善意的態度，雅克·德·科特雷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甚至在澳門事件發生之後，雅各·范·內克也“沒有對葡人進行報復”，儘管他完全可以這樣做，祇要是他願意的話，因為他“是位有善心的人”。⁽⁷¹⁾

不過，這一局面最終還是發生了根本變化。1602年8月，一個剛從荷蘭回到里斯本的名叫佩羅·羅德里格斯的葡商人立刻向政府報告說，在荷蘭“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那些即將開赴印度的船主們商定成立一個新的貿易聯合會來協調其航行；該聯合會的正式名稱為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為VOC公司；在其倡議下，由一共二十六艘十分漂亮的商船組成的船隊這年從厄蘭島起航”⁽⁷²⁾。這些荷蘭人憑藉其自1595年以來所不斷收集的資料及其在亞洲的經驗，制定了一份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從那以後，亞洲的局勢就再也沒有回到從前那個樣子了，因為VOC公司在一個擴大的委員會的領導下，對亞洲事務開始實行一種與葡人在一個世紀之前所一貫採取的迥然不同的政策：奪取葡人在一些戰略要地所建立的牢固基地；展示自身最強大的航海及軍事實力；在整個亞洲海域建立商業網點和代理商辦事處；同亞洲各地的當權者們結

盟；積極參與亞洲的各種商業活動和一切抗擊葡人的政治及軍事活動。⁽⁷³⁾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這一行動計劃早在法范·內克遠征船隊帶回荷蘭有關蒂多雷事件和澳門事件的情況報告之前就制定出來了。⁽⁷⁴⁾

現存的葡萄牙史料可以證明，“荷蘭威脅”在亞洲增加得非常迅速，就像當時所發生的一些典型事件所清楚表明的那樣。譬如在1603年12月，果阿大主教唐·阿萊紹·德·梅內塞斯(Dom Aleixo de Meneses)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可以告訴閣下一些非常壞的新消息，我們這個國家，特別是最南部的邊遠地帶，目前已處於非常危險和困境之中”，因為荷蘭人不僅在那些地方“奪取我們的商埠，還搶劫我們停靠在那些海域的船隻”。⁽⁷⁵⁾稍晚些時候，編年史家迪奧戈·多·科托在寫給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到，在印度，所有的人都懼怕“這些路德教信徒”。他還表示相信隨着事態的發展，那些荷蘭人不久就會成為“所有島嶼的、馬尼拉的、甚至是中國城市澳門的主人，以及同日本貿易的主宰”。在其信的末尾，迪奧戈·多·科托無比悲觀地認為：“若是讓這一事態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在果阿就將無事可做了；到那時，我們將不得不離開這裡，去別的地方尋求我們的新生活了。”⁽⁷⁶⁾

面對荷蘭人咄咄逼人的競爭，果阿的觀察家們最後都開始驚慌起來。的確，在VOC公司成立後的幾年內，荷蘭人在其東方事業中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成績。關於這點，現存的葡萄牙史料中有詳細的記載。1603年初，雅各·范·赫恩斯克科爾克率領的船隊捕獲來自澳門的“聖卡塔林娜”號大船或許就是荷蘭人在這方面取得的最為引人注目的成就了。⁽⁷⁷⁾根據當時伊比利亞王國政府無疑有些誇大的說法，這艘船是澳門“最大、實力最強並最富有的船隻”，之前“從未從中國出發過”⁽⁷⁸⁾；當時船上裝滿了絲綢和瓷器，其價值估計超過相當於二十八噸銀幣的一百萬克魯扎多。⁽⁷⁹⁾不久之後，也在這一年內，荷蘭人又在澳



科欽炮臺

引自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之《東印度國炮臺和城鎮圖集》，里斯本國家造幣廠印刷所，1992年。

門附近海域捕獲了葡人的另一艘滿載貨物的商船，當時這艘船正準備起航去日本。⁽⁸⁰⁾1604年，一支由十艘戰船組成的荷蘭艦隊竟然封鎖果阿地區的曼德維河(Mandovi)河口長達二十天之久，這些船隻遊弋在那片海域“猶如是航行在自家的水域航道上一樣”⁽⁸¹⁾。當他們航行到更北的地方時，即到了蘇拉特(Surate)附近，又“捕獲了一艘從霍爾木茲開來的滿載着珍貴木材和其它貨物的葡船。結果，荷蘭人用船上的木材將這艘和另外兩艘船燒燬了”。其後不久，荷蘭艦隊在科欽市燒燬了停靠在其港口的一艘屬於費爾南·德·阿爾布格爾格的商船；他們隨後繞過錫蘭的加勒岬角，搶奪了一艘從孟加拉開來的

大船。⁽⁸²⁾根據一份耶蘇會史料，一年以後，又一艘葡船在爪哇海域被史蒂文·范·德爾·哈格亨(Steven van der Haghen)率領的荷蘭艦隊捕獲，他們接着又“一槍未放”地佔領了葡人的阿莫依諾炮臺。⁽⁸³⁾這一事件對葡人造成的心理影響，或許值得必要的強調，因為這是落入荷蘭人手中的第一個葡萄牙炮臺，儘管他們奪走該炮臺是在十分特殊的情況下發生的：那個葡萄牙商埠的一些當地居民突然把那裡的首領“首領”捆綁起來交給了荷蘭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荷蘭人就輕易地“奪取了炮臺”。⁽⁸⁴⁾據說，葡萄牙人及其追隨者之後曾“發誓要將失去的炮臺奪回來，要報復荷蘭人”。⁽⁸⁵⁾

從葡萄牙人的觀點看來，荷蘭人初期的東方之行能夠取得一些驚人的成果是不難解釋的。對此在當時的史料中有各種各樣的評論。神學界有些人，譬如路易士·費爾南德斯(Luís Fernandes)神甫認為這些事件的發生是上天對印度所犯下的各種罪孽的懲罰。⁽⁸⁶⁾不過，葡萄牙的史料中對神學界這樣的解釋並不以為然，它們對此的解釋較為務實：荷蘭人之所以取得這樣驚人的成果，頭一位原因或許是葡萄牙人的輕敵和荷蘭人擁有的巨大優勢。葡萄牙人一個世紀來對“好望角航線”的壟斷可能在自己心中造成戰無不勝和無人能懲罰的感覺；在“印度國”有份量的觀察家們可能覺得入侵印度洋的“那些荷蘭人是一群異端的、粗俗的和下流的烏合之眾”。⁽⁸⁷⁾其實，荷蘭人並非如此。在1595至1605這短短的十年間，荷蘭和澤蘭就派出了一百艘左右的船隻到東印度來⁽⁸⁸⁾；他們直接進攻了“印度國”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那些葡萄牙人軍事防禦及航海力量較為薄弱的地方，搞得葡萄牙人措手不及和驚恐萬狀。此外，在這些地方，對於荷蘭人來說還擁有另外一個優勢：當地的權貴們雖然內部不團結和矛盾很深，但他們都敵視葡萄牙人，都總是打擊葡萄牙人。這就為荷蘭人利用這一點同其結盟共同對付葡萄牙人提供了機會。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的軍事及航海實力，從1600年時期歐洲的水準來看，可能已經過於渙散、薄弱和落後了。葡萄牙兵士及其頭領們“已經商業化了”，雖然“其戰艦在海域遊弋，但滿載着的不是用來作戰的武器，而是用來賺錢的各種商品”。⁽⁸⁹⁾此外，葡萄牙人長期來都無組織無紀律，他們習慣採取亞洲人的作戰方法，特別迷信肉搏戰，而常將大炮置於一旁不用。面對像荷蘭人那樣的以大炮武裝起來的艦隊，葡萄牙人自然處於劣勢。有些葡萄牙文獻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荷蘭人總是想方設法避免過於近距離的戰鬥，寧願相信他們的大炮從適當的距離進行炮擊的威力。譬如，安東尼奧·德·戈維亞(António de Gouveia)神甫1609年在果阿就特別寫道：荷蘭

人到那時所取得的勝利都是他們“憑藉其大炮群體的威力及其統帥的靈活機動指揮”的結果，他們“從不輕易靠近我們的船隻，更不會同我們近距離作戰的”。⁽⁹⁰⁾

在有些方面荷蘭人的確值得稱贊，譬如他們擁有技術優勢，他們的組織嚴密等。對此，當時的不少葡萄牙作品都沒有忘記提及。梅爾希奧·埃斯塔西奧·多·阿馬拉爾(Melchior Estácio do Amaral)在1604年寫了一篇關於一艘於兩年之前回國的葡萄牙船隻在途中遭遇海難的文章。其中寫道，這艘“聖地亞哥”號商船在聖海倫娜島遭到從印度尼西亞開來的三艘荷蘭戰船的襲擊，其指揮為科爾內利斯·巴斯蒂昂茲(Cornelis Bastiaansz)。該作品是作者根據那艘葡萄牙商船的倖存者所提供的情況寫成的。據倖存者說，敵船都是強大的戰艦，每艘都配備有“三十多門銅炮”，並運載着“大量先進的武器和戰警人員”，以及“可觀的彈藥”；上層甲板上沒有堆放任何貨物；其大炮都由專業人員操縱。與此相反，那艘葡萄牙船隻的上層甲板上卻堆滿海員們的大箱子以及商人的貨捆，以至於他們在那上面連挪動一下步子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就更談不上還要對付敵船的突然襲擊了。此外，每艘荷蘭船上都有“近百名船員”，他們都是屬於異端教派——加爾文教派的信徒，他們“集兵士、海員和炮手為一身”；所有這一切通常就是“荷蘭船隻優勝於我們的地方”。⁽⁹¹⁾稍晚些時候，又有一位名叫安東尼奧·杜朗(António Durão)的葡萄牙人，同樣讚揚荷蘭人的機靈，贊揚荷蘭人開到印度洋來的船隻的先進和牢固，說它們都是用“好木頭”建造的，船體填縫十分嚴密，尾舵和火藥庫都是“用摩爾人的銅鋅合金包嚴了的”。⁽⁹²⁾此外，這位葡萄牙作者還說到，荷蘭人的航海技藝“十分高超”。⁽⁹³⁾

由於種種明顯的原因，從16世紀後幾十年來，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國南海就成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爭奪的主要場所。因為，首先，許多亞洲最珍貴的商品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中國以及印

度支那的一些地區。其次，“印度國”的力量在亞洲最遙遠的廣大地區是薄弱的，通常祇局限在如中國沿海的澳門或馬魯古群島上的蒂多勒城堡這樣的少數定居點。第三，由於在16世紀頭幾十年葡萄牙人發覺自己在整個亞洲海域祇是在這裡或那裡有些參與，感到荷蘭人大有建立其亞洲帝國網絡的趨勢。最後，第四，那些荷蘭人很快認識到號稱“天朝帝國”的中國佔據着遠東世界的中心，那裡不僅傳播着各種亞洲文明，還充滿生氣勃勃的商機。此外，他們還認識到，如果能夠利用中國商品來作為交換貨幣，同日本的貿易就一定能夠興旺。

於是，很早以來，荷蘭遠征隊就着手尋找中國海岸，希望同廣東省當局打交道，以便首先同其發展正常的貿易關係，然後達到被允許像葡萄牙人那樣在中國沿海建立固定商埠的目標。當在這個問題上無法同中國官員達成像葡萄牙人獲得澳門那樣的協定後，荷蘭人便採取更為粗暴的策略，竟然包圍澳門這座中葡城市，攻擊航行在中國南海的澳門商船。顯然，這樣一來，航行於果阿與長崎之間的、並必定在澳門停留的葡萄牙商船擬運輸到歐洲的大量財富就遭到嚴重損失；像1603年在聖卡塔林娜島遭遇海難的葡萄牙船隻被劫掠的場景在17世紀頭幾十年裡便不斷發生。這一連串事件對於澳門的葡萄牙精英們說來，無疑是鉅大的災難，並因此感到十分的絕望。

荷蘭人對澳門發動的最為嚴重的進攻發生在西班牙和荷蘭達成休戰協定十二年之後的1622年；在這之前，雙方在東亞基本上保持在休戰的狀態之下。⁽⁹⁴⁾這年四月，一支強大的荷蘭艦隊從他們早在1619年就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大本營的爪哇島的港口城市巴達維亞(Batavia)出發徑直駛向中國海岸。6月22日，科內利斯·雷傑爾森(Cornelis Reijersen)指揮其艦隊的八百名兵士，憑藉其十五艘船艦上配備的火炮，猛烈地攻打澳門。當時荷蘭的所有報道都說這將是一次較為簡單的軍事行動，荷蘭人必然取得勝利，因為

他們面對的是相對虛弱的葡萄牙防衛，無論葡萄牙人的防禦工事或是武裝人員都無法同荷蘭的相比擬。就在此事件發生之前不久，一支葡萄牙遠征隊離開澳門去北京向明朝當局尋求軍事援助，當時明王朝的軍隊正在中國北疆抗擊滿洲人的猛烈進攻。⁽⁹⁵⁾然而，與荷蘭人的期望相反的是，他們最終在澳門遭到了不光彩的慘重的軍事失敗。據當時一則葡萄牙文報道，荷蘭人在這次敗戰中喪命的兵士達三百人之多。⁽⁹⁶⁾荷蘭人奪取澳門的企圖的失敗致使他們從此永遠地離開了這段中國海岸，使他們在試圖同“天朝帝國”建立商貿關係的進程中不得不去另闢蹊徑。於是在隨後的數年中，在嘗試接近“澎湖列島”(Ilhas dos Pescadores)之後，終於得以在臺灣建立了一個相對牢固的基地。

荷蘭人來到亞洲無疑令葡萄牙人感到十分驚嚇。他們對荷蘭人的武裝進攻不敢針鋒相對，而主要是憑藉所佔據的地理優勢，有時甚至是自身的社會地位和意識形態來加以對付；雖然來自里斯本、果阿和其它地方的反映總的來說相當悲觀，甚至擔心東方葡萄牙帝國有朝一日會崩潰，但伊比利亞王國和“印度國”還是作出了某些迅速而激烈的反應。不過荷蘭人對此不但並不懼怕，反而作出更為強烈的反應，照樣逐步地佔領亞洲海域的一些戰略要地，從而令“印度國”不得不在貿易、軍事和航海等方面面對一系列新問題。為了保持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地位和影響，伊比利亞王國政府不斷向“印度國”下達命令，有時甚至提供相應的人力及物力資源，旨在重組“印度國”的防衛力量和採取強有力的反擊措施。在其後的數年內，葡萄牙人修復或重建許多要塞和炮臺，並在這些地方重新配備必要武器和軍事人員；製造大量新大炮、優質火藥和各種尺寸的戰船；在各海域航道上採取一系列安全措施；想方設法奪取新陣地並同當地的昔日敵人結盟，並為所有航行活動配備武器等。於是，荷蘭人在幾乎所有的亞洲海域都遭遇到葡萄牙人的騷擾和襲擊，以至於不得不疲於面對。⁽⁹⁷⁾最

終，“印度國”得以頂住了荷蘭人的進攻，而未受到巨大的損失。葡萄牙人之所以要這樣頑強地抵抗，正如果阿市政廳在給菲利普三世的信中所說的，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了“沒有南部就沒有印度”的道理。⁽⁹⁸⁾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搜集到的葡萄牙史料祇是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末這一百多年間有關荷蘭人進發東方的情況的大量手稿和印刷出版物的很小的一部分。有關此問題的任何現存系統的資料清單至今還沒有。⁽⁹⁹⁾不過，我們搜集到的這些資料的種類已不算太少，它包括了伊比利亞王國與其東方臣民之間的許多正式函件，以及大量的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的信件和報告、航海日誌、遊記、海難記事、宗教和帝國編年史等等。此外，關於葡萄牙人感到的荷蘭威脅問題，一些渴望成為政治決策者的人，譬如像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達·西爾維拉(Francisco Rodrigues da Silveira)和杜阿爾特·戈麥斯·索利斯等所謂“仲裁”文學的詮釋者們已經做出了特別的理論闡述；一些狂熱的帝國衛士，譬如像塞拉芬·德·弗雷塔斯(Serafim de Freitas)這樣的“自由海洋論”反對者們同樣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¹⁰⁰⁾所有這些史料，都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對荷蘭人在亞洲的推進以及葡萄牙人對此做出的回應進行了描述和評論；而且在這些史料中有時也對伊比利亞王國的官方政策進行了批評，同時也提出了某些改革主張。儘管如此，對於這些問題的一系列研究，包括本文的探討無疑都是初步的，還有待於澳門學術界未來進行深入廣泛的研究，從而對此領域做出更大的貢獻。

【註】

(1) 關於“印度國”及其“影子國”的基本特點，請參閱桑傑·蘇布拉曼揚(Sanjay Subrahmanyam)：《從1500年到1700年的亞洲葡萄牙帝國：政治經濟史》(*O Império Português Asiático, 1500-1700. Uma História Política e Económica*)，頁77-112。

- (2) (3) (4) 參閱《葡萄牙王國在印度各地的城市及要塞記事》(*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 que a Coroa de Portugal tem nas partes da Índia*)，fl. 79v, fl. 57v。
- (5) 參閱梅林克·羅洛夫斯(Meilink-Roelofs, M. A. P.)：《1500年至1630年前後的亞洲貿易和歐洲在印度尼西群島的影響》(*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頁174-176。
- (6) 迪奧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首位注重實際的戰士》(*O Primeiro Soldado Prático*)，頁538-539。
- (7) 參閱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迪奧戈·多·科托圖書館》(*A Biblioteca de Diogo do Couto*)。
- (8) 參閱桑傑·蘇布拉曼揚：《從1500年到1700年的亞洲葡萄牙帝國：政治經濟史》，頁152。
- (10) 參閱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Maria Manuela Sobral Blanco)：《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1595-1641)》(*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1641)*)，卷二，頁15。
- (11) 《東方葡萄牙檔案》(Arquivo Português-Oriental)，卷三，第一部分，頁317-318和頁389-390。
- (12) 參閱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一，頁90。
- (13) (14) 同上，卷二，頁21；頁23。
- (15) 簡·哈依吉恩·範·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簡·哈依吉恩·範·林旭登東印度之旅》(*Itinerário ou Viagem de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às Índias Orientais*)，卷三，頁117。
- (16) (17) 《東方葡萄牙檔案》，卷三，頁886。
- (18) 參閱唐納德·拉克和埃德溫·範·克利(F. Donald Lach & Edwin J. Van Kley)：《歐洲發展進程中的亞洲卷三：一往無前的世紀》(*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卷三，頁438-439；請參閱托馬斯·蘇亞雷斯(Thomas Suárez)：《東南亞的早期面貌》(*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還請參閱埃恩斯特·範·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Daniel Klijn)：《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1594-1797)》(*A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Dutch-Portuguese Relations in Asia (1594-1797)*)，頁103。
- (19) 迪奧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第十二個十年》，卷一，第七章，頁50。
- (20) 同上，卷一，第七章，頁51。
- (21) 同上，卷一，第十二章，頁93。
- (22) 埃恩斯特·范·維恩：《衰敗還是失敗？對1580至1645年間葡萄牙人在亞洲逐漸沒落的研究》(*Decay or*

- Defeat? An inquiry into the Portuguese decline in Asia, 1580-1645*, 頁120.
- (23) (24) (25) (26) 《東方葡萄牙檔案》，卷三，頁884；頁873；頁885；頁884。
- (27)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二，頁39。
- (28) 唐納德·拉克和埃德溫·范·克利：《歐洲發展進程中的亞洲》，卷三，頁43。
- (29) 請參閱喬治·馬塞爾曼(George Masselman)的作品《殖民主義的搖籃》(*The Cradle of Colonialism*)，頁109-132；恩斯特·范·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的作品《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1594-1797)》，頁104。
- (30) 《葡萄牙海外文獻集》(*Documentação Ultramarina Portuguesa*)，卷二，頁45。
- (31) 迪奧戈·多·科托：《第十二個十年》，卷一，第七章，頁57-58。
- (32) 同上，第十六章，頁121-126。
- (33) 埃恩斯特·范·維恩：《衰敗還是失敗？對1580至1645年間葡萄牙人在亞洲逐漸沒落的研究》，頁149。
- (34) 迪奧戈·多·科托：《第十二個十年》，卷五，第七章，頁505
- (35) (36) (37)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二，頁43；頁53；頁54。
- (38) 這裡指的是亞琛(Achém)、柔佛(Johore)、巴賽(Pacém)、安德拉吉爾(Andragir)、加帕拉(Japara)、佩拉克(Perak)、盤奧(Pão)和巴拉母布昂(Balambuão)等王國的君主。
- (39)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二，頁56。
- (40) 請參閱喬治·馬塞爾曼：《殖民主義的搖籃》，頁109-132。
- (41) 若昂·多斯·桑托斯(João dos Santos)：《東方埃塞俄比亞》(*Etiópia Oriental*)，頁666。荷蘭史料中提到一個發生在亞琛的類似情節，其中說所有的一切都祇不過是葡萄牙人策劃的一個陰謀(參閱埃恩斯特·范·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的作品《1594至1797年間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頁107)。
- (42) 《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二，頁470[10-V-1599]。
- (43) 同上，頁475-476[8-VIII-1599]。
- (44) 同上，頁485[25-IV-1600]。
- (45) 馬努埃爾·洛巴托(Manuel Lobato)：《1575年至1605年間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菲律賓、馬六甲和馬魯古的政策及貿易》(*Política e Comércio dos Portugueses na Insulândia. Malaca e as Molucas de 1575 a 1605*)，頁110-135。
- (46) 參閱巴托洛梅·倫納爾多·德·阿耿若拉(Bartolomé Leonardo de Argensola)：《征服馬魯古群島》(*Conquista de las Islas Malucas*)，頁232。還請參閱費爾南·格雷羅(Fernão Guerreiro)：《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suas Missões*)，卷一，頁49-50。
- (47) 請參閱倫納德·布魯塞和喬治·威紐斯(George D. Winius)：《荷蘭人侵略印度國的緣由及步伐》(*The Origin and Rhythm of Dutch Agression against the Estado da India*)，頁75-76。
- (48) 請參閱迪奧戈·多·科托：《第十二個十年》，卷五，第二章(第49頁)中的相關記述：“有一艘船冒着風險，全速駛向馬魯古群島”(頁449)；“他們揚帆出海駛向馬魯古，最後抵達蒂多雷島的索利附近，離我們的炮臺僅有半海浬”(頁450)。
- (49) 《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二，頁516-517。
- (50) 安東尼奧·拜昂(António Baião)：《果阿宗教裁判所》(*A Inquisição de Goa*)，卷二，頁326。
- (51) 倫納德·布魯塞和喬治·威紐斯：《荷蘭人侵略印度國的緣由及步伐》，頁76；埃恩斯特·范·維恩：《衰敗還是失敗？》，頁178，第14期。
- (52) 雅克·德·科特雷(Jacques de Coutre)：《亞洲之旅》(*Andanzas asiáticas*)，頁155-156。
- (53) (54) 《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二，頁517-518；頁245。
- (55) 費爾南·格雷羅：《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卷一，頁269。
- (56) 雅克·德·科特雷：《亞洲之旅》，頁156。
- (57) 費爾南·格雷羅：《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卷一，頁236。還請參閱埃恩斯特·范·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的作品《1594至1797年間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頁106。
- (58) 洛瑞羅：《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頁543-588。
- (59) 馬內爾·奧勒(Manel Ollé)：《中國事業：無敵艦隊到馬尼拉的加勒奧恩》(*La empresa de China. De la Armada Invencible al Galeón de Manila*)。
- (60) 費爾南·格雷羅：《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卷一，頁237。關於該事件，還請參閱倫納德·布魯塞(Leonard Blussé)：〈在澳門的短暫會面〉(“Brief encounter at Macao”)，頁647-664。
- (61) 雅克·德·科特雷：《亞洲之旅》，頁156。
- (62) 請參閱《澳門檔案》卷一，第二期，頁58-59。
- (63) 倫納德·布魯塞和喬治·威紐斯：《荷蘭人侵略印度國的緣由及步伐》，頁76-77。

- (64) 《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二，頁521。這些記述在荷蘭史料中得到了印證(請參閱埃恩斯特·範·維恩：《衰敗還是失敗？對1580至1645年間葡萄牙人在亞洲逐漸沒落的研究》，頁148-150)。不過，關於葡萄牙人的看法，馬烏里赤親王在其1600年寄給亞琛王國君主的一封信中表示了相當否定的意見(請參閱埃恩斯特·範·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1594至1797年間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頁106)。
- (65) 雅克·德·科特雷：《亞洲之旅》，頁157。
- (66) 保羅·若熱·德·索薩·平托 (Paulo Jorge de Sousa Pinto): 《葡萄牙人和馬來人：馬六甲和柔佛及亞琛王國的君主》(*Portugueses e Malaios. Malaca e os Sultanatos de Johor e Achém*)，頁285。
- (67) 瑪麗亞·索布拉爾·布蘭科(Maria Manuela Sobral Blanco): 《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1595-1641)》(*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1641)*)，卷二，頁63。
- (68) 請參閱查爾斯·博克瑟和若澤·弗拉贊·瓦斯康塞洛斯(José Frazão Vasconcelos): 《安德列·富爾塔多·德·門東薩》(*André Furtado de Mendonça*)，頁37-54。
- (69)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二，頁68。
- (70) 《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二，頁608。
- (71) 雅克·德·科特雷：《亞洲之旅》，頁156。
- (72)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二，頁90。
- (73) 埃恩斯特·范·維恩：《衰敗還是失敗？……》，頁147-207。
- (74) 埃恩斯特·范·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1594至1797年間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頁105。
- (75)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卷二，頁94。
- (76) 迪奧戈·多·科托：《數十年代》，卷一，頁lvi-lviii。
- (77) 參閱費爾南·格雷羅：《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卷二，頁90-91。還請參閱埃恩斯特·範·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1594至1797年間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頁106。
- (78) 《東方葡萄牙檔案》，卷一，第二部分，頁113。
- (79)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頁114。
- (80) 查爾斯·博克瑟：《來自阿媽港的大船：1555-1640年間澳門同古代日本貿易編年史》(*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the Macao and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頁67。
- (81) (82) 迪奧戈·多·科托：《數十年代》，卷一，頁lv。
- (83) 參閱《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二，頁679；還請參閱《海外文獻資料集》，卷一，頁145。
- (84) 迪奧戈·多·科托：《數十年代》，卷一，頁lvii。
- (85) 《海外文獻資料集》，卷一，頁145。
- (86) 《馬魯古文獻資料集》，卷三，頁69。
- (87) 《海外文獻資料集》，卷二，頁46。
- (88) 埃恩斯特·范·維恩：《衰敗還是失敗？……》，頁173。
- (89) 《海外文獻資料集》，卷二，頁45-46。
- (90) 安東尼奧·杜朗(António Durão): 《荷蘭人圍攻莫桑比克城堡史》(*Hystorya dos Cercos Que os Olandezes puzerão à Fortaleza de Mozambique*)，頁477(安東尼奧·德·戈維亞為此圍攻記事寫引介信)。
- (91) 梅爾喬·埃斯塔昔奧·多·阿馬拉爾(Melchior Estácio do Amaral): 《聖地亞哥號戰船在聖海倫娜島同荷蘭人作戰及其戰績》(“Tratado das batalhas e sucessos do galeão Santiago com os holandeses na ilha de Santa Helena”)，頁484-485。佛羅倫薩商人弗蘭西斯科·卡蒂蒂曾乘坐過這艘戰船(關於此事，請參閱其：《環遊世界》(*Voyage autour du Monde*)，頁267-284)。
- (92) (93) 安東尼奧·杜朗：《荷蘭人圍攻莫桑比克城堡史》，頁522；頁483。
- (94) 請參閱查爾斯·博克瑟：《澳門歷史研究：從16世紀到18世紀》(*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 Séculos XVI a XVIII*)，頁19-102。其中包括對荷蘭人進攻澳門的重要研究。亦請參閱倫納德·布魯塞：《在澳門的短暫會面》，頁647-664。
- (95) (96) 查爾斯·博克瑟：《16-18世紀澳門歷史研究》，頁105-133；頁35。
- (97) 參閱《寄自印度之文獻集》(*Documentos Remetidos da Índia*)，卷一，頁35、頁58、頁93、頁95、頁96、頁98、頁99、頁102等。
- (98) 《東方葡萄牙檔案》，卷一，第二部分，頁112-113。
- (99) 但是，請參閱達雅·德·席爾瓦(Daya de Silva)：《葡萄牙語在亞洲》(*The Portuguese in Asia*)。
- (100) 參閱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西爾維拉(Francisco Rodrigues Silveira): 《東印度國軍隊及政府改革》(*Reformação da Milícia e Governo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頁243-263；杜阿爾特·索利斯(Duarte Gomes Solis): 《為東印度公司辯護》(*Alegacion en favor de la Compañia de la India Oriental*)；杜阿爾特·戈麥斯·索利斯(Duarte Gomes Solis): 《關於同印度人進行

貿易的演說集》(*Discursos sobre los comercio de las dos Indias*)；塞拉芬·弗雷塔斯(Serafim Freitas)：《正義的亞洲帝國》(*Do Justo Império Asiático*)。

【參考書目】

- 梅爾喬·埃斯塔昔奧·多·阿馬拉爾(Melchior Estácio do Amaral)：〈論聖地牙哥號戰船在聖海倫娜島同荷蘭人作戰及其戰績〉(“Tratado das batalhas e sucessos do galeão Santiago com os holandeses na ilha de Santa Helena”)，參閱朱利亞·蘭西阿尼(Giulia Lanciani)：《葡萄牙船艦的業績及其遭遇的海難》(*Sucessos e Naufrágios das Naus Portuguesas*)，里斯本，卡米紐出版社，1997年，頁475-552。
- 《葡萄牙東方檔案》(*Arquivo Portuguez-Oriental*)，若阿金·埃利奧多羅·達·庫尼亞·里瓦拉版本，六卷，新德里，亞洲教育服務社出版，1992年。
- 巴托洛梅·倫納多·德·阿耿若拉(Bartolomé Leonardo de Argensola)：《征服馬魯古群島》(*Conquista de las Islas Malucas*)，馬德里，Miraguano Ediciones & Ediciones Polifemo 出版，1992年。
- 《澳門檔案》(*Arquivos de Macau*)，三卷集，澳門，澳門印刷廠，1929-1931年。
- 安東尼奧·拜昂(António Baião)《果阿宗教裁判所》，二卷集，科英布拉大學印刷所，1930-1949年。
- 瑪麗亞·馬努艾拉·索布拉爾·布蘭科(Maria Manuela Sobral Blanco)：《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1595-1641)》(*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1641)*)，二卷集，里斯本，里斯本大學文學院，1974年[尚未發表的學士論文]。
- 倫納德·布魯塞(Leonard Blussé)：〈在澳門的短暫會面〉(“Brief encounter at Macao”)，參閱《近代亞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 (康橋)，卷二十二，1988年，頁647-664。
- 倫納德·布魯塞和喬治·D·威紐斯(George D. Winius)：“1601至1661年間荷蘭人侵略印度國的緣由及步伐”(“The Origin and Rhythm of Dutch Agression against the Estado da India, 1601-1661”)，參閱《印度葡萄牙史：舊問題，新爭議》(*Indo-Portuguese History: Old Issues, New Questions*)，Teotónio R. de Souza 版本，新德里，Concept 出版公司，1985年，頁73-83。
- 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來自阿媽港的大船：1555-1640年間澳門同古代日本貿易編年史》(*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the Macao and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63年。
- 查爾斯·博克瑟：《16-18世紀澳門歷史研究》(*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 Séculos XVI a XVIII*)，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1年。
- 查爾斯·博克瑟和若澤·弗拉贊·瓦斯康塞洛斯(José Frazão Vasconcelos)：《安德列·富爾塔多·德·門東薩》(*André Furtado de Mendonça*)，澳門，東方基金會和澳門海外研究中心，1989年。
- 弗蘭西斯科·卡雷提(Francesco Carletti)：《環遊世界(1594-1606)》(*Voyage autour du Monde (1594-1606)*)，Paolo Carile 和 Frédérique Verrier 的譯本，巴黎，Chandeigne 出版，1999年。
- 迪奧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數十年代》(*Décadas*)，安東尼奧·拜昂版本，二卷集，里斯本，薩達科斯塔書店出版，1947年。
- 迪奧戈·多·科托：《第十二個十年》，1788年版摹本，里斯本，聖卡洛斯書店出版，1974年。
- 迪奧戈·多·科托：《首位注重實際的戰士》，安東尼奧·科英布拉·馬丁斯版本，里斯本，紀念葡萄牙大發現全國委員會，2001年。
- 雅克·德·科特雷(Jacques de Coutre)：《亞洲之旅》(*Andanzas asiáticas*)，Eddy Stols, Benjamin N. Teensma 和 Johan Verberckmoes 版本，馬德里，1991年。
- 《馬魯森西亞文獻集》(*Documenta Malucensia*)，Hubert Jacobs 版本，三卷集，羅馬，社會歷史研究所，1974-1984年。
- 《葡萄牙海外文獻集》(*Documentação Ultramarina Portuguesa*)，António da Silva Rêgo編撰，五卷集，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60-1967年。
- 《寄自印度的文獻或關於季風之記事》(*Documentos Remetidos da Í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Rai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 e António da Silva Rêgo 編撰，十一卷集，里斯本，里斯本皇家科學院/里斯本科學院，1880-1982年。
- 安東尼奧·杜朗(António Durão)：〈荷蘭人圍攻莫桑比克城堡史〉(*Hystorya dos Cercos Que os Olandezes puzerão à Fortaleza de Mozambique*)，《研究》(里斯本)，第十二期，1963年，頁462-548。
- 塞拉芬·弗雷塔斯(Serafim Freitas)：《正義的亞洲帝國》(*Do Justo Império Asiático*)，Marcello Caetano 版本，Miguel Pinto de Meneses 翻譯，二卷集，里斯本，國家科學研究所，1983年。
- 費爾南·格雷羅(Fernão Guerreiro)：《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suas Missões*)，Artur Viegas 版本，三卷集，科英布拉大學印刷所，1930-1942年。
- 唐納德·拉克和埃德溫·范·克利(Donald F. Lach & Edwin J. Van Kley)：《歐洲發展進程中的亞洲》卷三〈一往無前

- 的世紀》(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四卷集,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1993年。
- 簡·哈依吉恩·范·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簡·哈依吉恩·范·林旭登東印度之旅》(Itinerário ou Viagem de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às Índias Orientais), Arie Pos & Rui Manuel Loureiro 版本, 里斯本, 紀念葡萄牙大發現全國委員會, 1997。
- 《葡萄牙王國在印度地區之城市及城堡記事》(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 que a Coroa de Portugal tem nas partes da Índia), Francisco Paulo Mendes da Luz 編著, 里斯本, 海外歷史研究中心, 1960年。
- 馬努埃爾·洛巴托(Manuel Lobato): 《1575年至1605年間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六甲和馬魯古的政策及貿易》(Política e Comércio dos Portugueses na Insulíndia. Malaca e as Molucas de 1575 a 1605), 澳門, 葡萄牙東方學會, 1999年。
- 洛瑞羅: 《迪奧戈·多·科托圖書館》(A Biblioteca de Diogo do Couto), 澳門, 澳門文化學會, 1998年。
- 洛瑞羅: 《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 16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里斯本, 東方基金會, 2000年。
- 喬治·馬塞爾曼(George Masselman): 《殖民地的搖籃》(The Cradle of Colonialism), 紐黑文, 耶魯大學出版社, 1963年。
- 梅林克·羅洛夫斯(M. A. P. Meilink-Roelofs): 《1500年至1630年前後的亞洲貿易和歐洲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影響》(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海牙, Martinus Nijhoff 出版, 1969年。
- 馬內爾·奧勒(Manel Ollé): 《中國事業: 從無敵艦隊到馬尼拉的加勒奧恩》(La empresa de China - De la Armada Invencible al Galeón de Manila), 巴塞羅拉, Alcantilado 出版, 2002年。
- 保羅·平托(Paulo Jorge de Sousa Pinto): 《1575到1619年間的葡萄牙人和馬來亞人: 馬六甲和柔佛及亞琛王國的君主》(Portugueses e Malaios. Malaca e os Sultanatos de Johor e Achém, 1575-1619), 里斯本, 葡萄牙獨立歷史學會, 1997年。
- 若昂·多斯·桑托斯(João dos Santos): 《埃塞俄比亞和東方大事記》(Etiópia Oriental e Vária História de Cousas Notáveis do Oriente), Manuel Lobato & Maria do Carmo Guerreiro Vieira 版本, 里斯本, 紀念葡萄牙大發現全國委員會, 1999年。
- 達亞·德·席爾瓦(Daya de Silva): 《葡萄牙語在亞洲》(The Portuguese in Asia), 瑞士, IDC, 1987年。
- 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西爾維拉(Francisco Rodrigues Silveira): 《東印度國軍隊及政府改革》(Reformação da Milícia e Governo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 Benjamin N. Teensma, Luís Filipe Barreto 和 George D. Winius 版本, 里斯本, 東方基金會, 1996年。
- 杜阿爾特·戈麥斯·索利斯(Duarte Gomes Solis): 《關於同印度人之貿易的幾篇演說》(Discursos sobre los comercios de las dos Indias), Moses Bensabat Amzalak 版本, 里斯本, s. e., 1943年。
- 杜阿爾特·戈麥斯·索利斯: 《為東印度公司進行辯護》(Alegacion en favor de la Compañia de la India Oriental), Moses Bensabat Amzalak 版本, 里斯本, s. e., 1955年。
- 托馬斯·蘇亞雷斯(Thomas Suárez): 《東南亞的早期面貌》(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 香港, Periplus 出版, 1999年。
- 桑傑·蘇布拉曼揚(Sanjay Subrahmanyam): 《從1500年到1700年的亞洲葡萄牙帝國: 政治經濟史》(O Império Português Asiático, 1500-1700. Uma história política e económica)里斯本, Difel出版, 1995年。
- 埃恩斯特·范·維恩(Ernst van Veen): 《衰敗還是失敗? 對1580至1645年間葡萄牙人在亞洲逐漸沒落的研究》(Decay or Defeat? An inquiry into the Portuguese decline in Asia, 1580-1645), 萊頓, 亞洲、非洲和美洲研究學會, 2000年。
- 埃恩斯特·范·維恩和達尼埃爾·克利金(Daniel Klijn): 《荷蘭與葡萄牙亞洲關係史研究指南(1594-1797)》(A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Dutch-Portuguese Relations in Asia (1594-1797)), 萊頓, 歐洲擴張史研究所, 2001年。

黃徽現譯

